



东西

交流史论稿

黄时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交流史论稿

黄时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东西交流史论稿

黄时鉴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42,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5-2466-3

K · 273 定价: 30.40 元

序 言

在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四十周年之际,我终于有了这次选编出版一部论文集的机会。限于篇幅,又为了集中于一定的范围,本文集收入了我在中外关系史领域写的 27 篇文章,绝大多数是 90 年代的。

从 1958 年开始,我长期以来做的是蒙古史、元史的研究工作。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四出征伐,元代的中外关系十分发展,尤其是中西关系有了空前的进展,这就引起了我对中西关系史的兴趣。大约从 80 年代中期起,我的精力开始更多地放在中西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自 1993 年春天起,沈善洪学长让我助他经管新成立的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我又做了一些中韩关系史的题目,并导致我将研究中西关系史的视角延伸到东西交流史。

收入本集的文章,有 8 篇属于各代中外关系史的具体问题,4 篇属于马可波罗研究,3 篇属于中伊(朗)关系史,5 篇属于大航海以来中欧关系史,7 篇属于中韩关系史。由于学术论文的写法取

决于论题与资料状况,各组文章甚至各篇文章不仅内容各异,而且自成体格。27篇文章已编订完毕,上海古籍出版社张晓敏先生希望我自己写一篇序言,我想就结合这些文章,谈谈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心得体会。

一

我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将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定为:一、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人种、语言、习俗等);三、中外通道的开辟和交通的方式;四、经济与物质生活方式的交流,生物的传播;五、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语文、传说、宗教、思想、科技、艺术、文学等)。东西交流史的内容也大体相当。如此看来,这门专史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在这样学术领域做研究工作,自然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

史学研究(不是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从史料出发。一般说来,人们注意的是大量地详尽地占有史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若要将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向前沿,就更需注意陈寅恪先生的如下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就行将终结的二十世纪中国而言,出现了哪些新材料呢?20年代时,王国维以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由新材料做出新学问者有五:即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四裔遗文。这五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在发展中。现在已临二十世纪之末,我们回

头来看,新材料又增加了许多。我想至少又可以列出以下五个方面:史前遗存、历代考古、清代档案、海外文献、外销遗物。囿于专业与闻知,缺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以上这些方面的新材料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关。史前遗存也有关吗?是的。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在对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古生物的研究中,就存在“中外关系”的问题,当然,这是属于史前范畴的问题。敦煌这个宝库更有关系。下面,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稍为具体地加以说明敦煌文书与壁画的无与伦比的潜力和潜质。本文集中有三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在关于中国烧酒的起始的讨论中,在考古文物资料方面的争论之一是榆林窟壁画上的所谓“酿酒图”。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它是否描绘了用蒸馏器制作烧酒;二、它的年代是否可定在西夏。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对他所见到的画面进行观察后最早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猜想对壁画的进一步研究将会发现在右边有一个连接冷却桶的侧管;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就是一幅蒙古画,而不是中国蒸馏器的画,而且在其中部还放置了一个收集碗。”^②现在我们很容易看到此画,可以肯定地说,李约瑟的这个猜想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壁画年代的鉴定方法问题。基本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对壁画的内容和画风进行分析,二是根据题铭进行研究。我在《中国烧酒的起始与中国蒸馏器》一文中对这些问题做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与李约瑟以及一些敦煌学家、西夏学家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幅画不是描绘了用蒸馏器制作烧酒;它的年代,与其断在西夏,毋宁说属于元代更为可信。我在进行这项研究时觉得,目前对所谓“西夏文化”的断代有失笼统,往往没有区分西夏亡国前后这个重要的界限。“西夏文化”的含义当是“西夏一朝的文化”;在西夏亡后,“西夏文化”不复存在,但仍有党项文化,唐兀文化,或给出其他名称。作出这样的区分,才有利于对党

项文化和西夏文化本身的研究。

另一个例子是：我与龚缨晏在合作撰写《佛国寺双塔与中国古塔的比较研究》一文时，也在敦煌壁画中找到了重要的资料。佛国寺是韩国新罗时代兴建的著名寺院，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众所周知，韩国的佛教是由中国传入的，其佛教建筑也深受中国的影响。可是真要研究我们提出的课题，可参考的成果却十分有限，资料也显得相当不足。在佛国寺的全部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宝塔。我们研究以后认为，它的真正特色在于：将四方形亭阁塔与八角形亭阁塔有机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塔。这种塔上加塔的组合形式在韩国可以上溯到一座金铜舍利塔，而它更早的起源应当还是来自中国。但是，在现存的隋唐古塔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塔上加塔，而我们正是在敦煌壁画中找到了种种塔上加塔的造型，从而使我们有立论的依据。

再一个例子是：我与龚缨晏在《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一文中也引述了几条敦煌文献资料。《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这篇文章着重讨论的是：马可波罗在蒙元时代来到中国时，他在入华以后能否见到长城？他所能见到的长城是什么样的？如果他见到长城遗址，他是否必定会将它认作长城而记载下来？我们研究以后认为，他至少在两个地方有可能见到长城遗址，一是在西部的敦煌地区，一是在从上都到大都的旅途上。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之一是秦汉以后有关敦煌地区的长城资料极少，而正是敦煌文献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困难。在此文中，我们引述了四种敦煌文书：斯5448号，《敦煌录》残卷；伯2691号，《沙州城土境》；伯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伯3929号，《敦煌古迹二十咏》。如果没有这几份敦煌文书，我们就难以圆满地完成此文的写作。

至于“海外文献”，我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时间内陆续流存在海外的中国文献，这已较多地引起中国学人的注意，尤其是海

外保存的珍本和特藏,一旦用于研究,往往会使研究的课题获得新的进展,甚至出现重大的突破。例如十九世纪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特藏共达 708 种(个别著作刊于二十世纪),其分类包括教义通论、圣经、神学、礼仪与传教士、教堂历史与传记、史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学与技术、生理学与医学,等等。若要研究十九世纪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无疑是一个资料的宝库。

另一类“海外文献”主要是指大航海以来西方人士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西文著作。这类文献当然在海外有很多的收藏,但是如果就一座图书馆的收藏量而言,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可以说都居于前列。据 1949 年出版的北堂书目,当时入目的书籍是 4101 种,这批图书一直保存在北京图书馆,据说近年已进行查核,极少缺失。上海图书馆在 1992 年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收有书籍 1831 种。这两批西文藏书,大多数都与中国有关,有的即使没有直接关系,但既已流藏中国,它本身已构成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内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珍贵的文献宝藏如何使从事研究的学人得以阅读利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图书馆的迄至 1850 年关于中国的西方书籍特藏,共 654 种,虽其数量远不及北图与上图,但已全部做成缩微胶片,为学人从事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所谓“外销遗物”,主要是指历代中国对外贸易(包括“贡赐”)中出口的物品。历史上,作为中国出口商品中最具特色、最受重视、最有影响的是丝绸、瓷器和茶叶。早在 60 年代,夏鼐先生已根据到那时为止发现的中国古代丝织品的遗址地点,从长安到西亚的哈来比、杜拉欧罗波和帕尔米拉,画出了一幅丝路简图,图中的路线正好同依据文献研究出来的丝绸之路相吻合。后来出土的丝绸遗物,使这幅地图不断充实起来。1967 年,在北高加索莫谢瓦

亚·巴勒卡墓葬中出土 143 件丝织物,以东的哈萨乌特墓出土 65 件,据研究,属于安国的产品占百分之六十,中国的与拜占廷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年代可断在八—九世纪。70—80 年代,在欧洲,远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比尔卡和什切青也发现了中国古代丝织物。从大航海时代起,丝绸仍然是中国向欧美销售的主要商品之一,迄今在欧美的许多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不少藏品。

与丝绸相比,在重要的外销物品中,茶叶的遗存极少,因为它是一种难以存留的消耗品。可是,也有偶然被保存下来的。例如从 1986 年起瑞典哥德堡水下考古学会连续数年对 1745 年触礁沉没的“哥德堡”号沉船进行打捞作业,在打捞出来的物品中就有 300 多吨中国茶叶。“由于这些茶叶在制造加工过程中经过紧压处理和密封包装,再加上当地海水含盐量较低,茶叶沉到海中后又由于泥沙的覆盖而没有受到氧化,所以在这些二百多年前的茶叶中,有一部分依然还可以饮用”^③。1992 年瑞典驻华大使在杭州访问中国茶叶博物馆时曾将一包从“哥德堡号”船上打捞出来的茶叶赠送给该馆,现已成为该馆珍贵的收藏与展品。1994 年我在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考察该馆所藏装茶木箱时,发现有一只木箱内还残存一些茶叶,若据箱上的标识,那是十九世纪的 Hyson Skin,即皮茶。这些茶叶的残存很少,但它能使中西茶叶贸易的历史倍加生动。尽管如此,茶叶与丝绸、瓷器等不同,它作为文物,在造型和工艺方面要逊色得多,再说也不大可能不断有新的发现。

在古代中国三大出口商品中,瓷器的遗留最为丰富,因为从唐代起,它的出口数量最多,最容易保存下来,而且最具有艺术方面的观赏价值。本世纪中,在古代中国陶瓷的海上输出地点,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北非、东非各地,不断有实物出土。最大的遗址出现在埃及。从 1912 年起,在埃及开罗南部的福斯塔特开始进行发掘,陆续出土大量陶瓷片,除了被带出埃及的以外,

留存的约有六、七十万片,其中约 12000 片属于中国陶瓷,此外多数是埃及本地的陶瓷,但十之七八也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这大约 12000 片中国陶瓷的所属年代,从八、九世纪的唐代一直延伸到十七世纪的清代,它们几乎罗致了华中、华南各个重要瓷窑的产品。60 年代,日本学者山上次男两次遍访埃及、东非、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东南亚各地有中国古陶瓷的博物馆和考古遗址,撰成著名的《陶瓷之路》一书。进入 70 年代以后,不仅埋有中国陶瓷的陆上遗址继续增加,而且与中国瓷器有关的海洋考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遗憾的是,除了个别的成果如 1976—1977 年在韩国新安海域所打捞的中国沉船上的瓷器以外,中国学术界所知甚少。拙文《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集中介绍 80 年代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业绩,旨在唤起国人的注意。我愿在此篇序言中重复该文结尾的一段话:

总之,哈契尔的两次沉船打捞向人们展示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使许多历史学家、艺术史家、陶瓷收藏家、古玩商人和一般民众分享了一次人类艺术创造和交流的巨大成果,而且在惊讶和激赏之余引发深邃的沉思和隽永的回味。瓷器是中国伟大的创造之一,它在世界物质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是中外贸易史上历时久远的重要商品,也曾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辉煌使者。哈契尔的打捞业绩,使沉没于海底的大量中国瓷器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这是文明之光,闪耀在全世界,具有永恒的、与世长存的魅力。

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外销瓷器,现在仍然被大量收藏在欧美的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中。随着 80 年代以来中国再一次打开国门,面向世界,世人的目光也再一次注视中国,这在文化艺术界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断有西方的博物馆举办中国外销瓷器展览会,

同时有不少研究中国外销瓷器的著作问世。其中,那种被称为“洋彩”的中国外销瓷十分引人注目。“洋彩”就是按照欧美商人的定货及其所提供的形制、图样和色彩而专门制作的中国外销瓷器。由于当时是外销产品,今天国内已属罕见,但欧美却有不少收藏。对于中国外销瓷器的研究虽已有人涉及,但尚待深入,而对于“洋彩”的研究在国内还几乎是空白。这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的光辉篇章,宜当引起国人的重视。

二

下面我想谈到研究方法的问题,都是与本文集所收文章直接有关的。

人们在掌握资料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必然存在研究方法的问题。研究的方法很多,我在这里想着重谈及的是学科交叉的方法。学科交叉是二十世纪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历史学也不例外。

我理解,学科交叉有两个含义:一、在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数理逻辑、地缘政治学,等等。二、在对某种学科从事研究时,采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在第二个义上,学科交叉往往是多边的。历史包罗万象,因而与历史学有关的学科特别多。二十世纪流行过的一些历史学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社会史学、边疆史学、传记史学、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也是直接建立在其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就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而言,我感到语言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相关学科。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先行学科,它的发展往往推进了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语言学的发展推进了历史学的研究,也是

显而易见的。大体上说,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密切关系集中地表现在采用语言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

我们所注意的语言学的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学方面。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世界若干地方发现了各种古文字。这些古文字本身大大丰富了人类的文明史,而这些古文字的解读则开掘了新的史料宝藏,使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所共知,西亚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中国甲骨文字和墨西哥玛雅文字的发现和解读,拓宽与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古文明史的认识。而在古代中西交流史方面,佉罗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等等的发现和研究,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任何一种古文字的研究都是一门颇有难度的专门学问,我们不大可能轻易破门而入,但是应该尽可能了解它们的进展,并在必要的时候掌握和利用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成果。

除了古文字,我们在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时候,实际上经常需要运用的是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应该如何进行表述,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简单地称之为“对音”,后来,有些学者更准确地称之为“审音和勘同”。就学科范畴而言,它无疑是一种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它属于语音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但语音学本身是包含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的,因而两个说法并无不协之处。

“审音和勘同”的方法是在十九世纪欧洲的语言学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从十九世纪后期起,西方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与东方学家不断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获得愈来愈多的显著成果。其中,法国学者伯希和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巨匠,他用这种方法破释了东方史、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许多疑团,推进了这些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大约从二十世纪初这种方法开始传入中国,但到了30年代才有学者真正掌握并使用它来解

决自己从事研究中遇到的难点。冯承钧在大量翻译法国学者论文的过程中,领会了这种方法的奥义,并在其《多桑蒙古史·译序(二)》一文中作出初步的归纳^④。后来,韩儒林发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和勘同》一文,明确提出:

要做好这一步工作,一、必须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懂得汉字的古代读音;二、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懂得西北民族的语言规律;三、还必须知道不同时代的翻译规则^⑤。

此文论题是关于西北民族史的,因而第二条行文如此;如果扩而言之,可以改作“必须学习相关民族的语文,懂得相关的语言规律”。这就是做“审音和勘同”工作的三条基本要求。顺便说一句,“审音和勘同”这个提法,至少是阐明做“审音和勘同”工作的三个基本要求,应该首先归诸韩先生。韩先生的这段概述,使我们后辈学人得益匪浅。

基本要求已明,那末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去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什么问题呢?

我们知道,当一种文字记载外来的、异族的事物时,常常采用音译的方法。这种音译的词汇涉及很广,包括人名、族名、国名、地名、物名、宗教名称、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名称,等等。在经历若干世纪以后,它们往往不为人们所了解。而且在中国文献中,有些外来词汇,中文中开始用音译,音写的用字还往往不一;后来又改为意译,原来的音译写法却渐渐地不为人知,如淡巴菰/谈巴菰/淡婆古—烟草、梵哑铃/梵哦玲/伐乌林/繁华令—小提琴之类。研究历史时,遇到这类词汇,史料就弄不明白,研究会陷入困境。反之,如果能对之作出正确的解释,那末研究工作便会取得进展,有时候它可能正是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下面,我再举述若干实例。

实例之一:关于异族对中国的称谓有 Čini/Cin/Sinae、Serice/

Seres、Kitai/Khitai/Cathay 和 Taughast/Tabghač 四个。Činī/Cīn/Sinae 可与“秦”勘同，Serice/Seres 可与“缙”或“丝”勘同，Kitai/Khitai/Cathay 可与“契丹”勘同，以及 Taughast/Tabghač 可与“拓跋”勘同。尽管除了 Kitai/Khitai/Cathay—契丹说别无异议外，其余三说均尚有各种不同意见，但有关的探索和讨论对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推动是肯定无疑的。拙文《“條贯主”考》是对伯希和考定 Taughast/Tabghač—“桃花石”（中国）的一个补充。1221 年丘处机西行时听到当地人以“桃花石”指称中国，今我在宋人笔记中发现政和七年（1117）的文书已将 Tabghač 译写作“條贯主”，比伯希和发现的“桃花石”早了一百多年。

实例之二：一般认为，中国文献中的“大食”指称的是阿拉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拙文《辽与“大食”》综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阐明源自伊朗语的 Tazik（大食）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起初指称阿拉伯人；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向东扩张和伊朗地区的伊斯兰化，它成为阿拉伯人和操伊朗语诸民族的统称，而且正是带着这个含义进入了突厥语。在突厥语中，这个词一般地只是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操伊朗语诸民族。”进而论证辽代所交往的“大食”并不是阿拉伯，而是萨曼王朝及其亡后迄至 1036 年以前的河中地区。西辽耶律大石“西至大食”，这个“大食”指的也是河中。又，中国文献中“回回”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辽史·部族表》中的“回回大食部”，则当是编纂《辽史》的元人按照蒙元时代“回回”一词起初指称地处河中一带的花刺子模而加给“大食”的说明。

实例之三：拙文《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用可靠的文献载录论证了元代的阿剌吉/轧赖机/阿里乞/哈刺基当是阿拉伯语 > 波斯语词‘araq 的音译，元代时‘araq—阿剌吉传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进行制造，乃是中国烧酒的起始；又，与‘araq—阿剌吉一词有

关的中国的文献资料和语言学资料相当丰富,在掌握较大量语言学资料的条件下,写出了如下的看法和感受:“作为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阿剌吉,在元代传入中国时先为汉语和蒙古语所借用,后又为维吾尔语、藏语和满语所借用;而藏语、满语借用它则又可能经由蒙古语的中介。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实际上,本文集中的多数论文在撰写时都运用了“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它使我有可能最后将这些论文写了出来。在这样反复实践以后,我感到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除了韩先生提出的三条要求,还可以注意到:一、要将对词汇的“审音和勘同”与对史料的分析缜密地结合起来;二、对于某些特定的语词,不仅要审音,而且要考察其词义的演变。三、甚至对于表面上含义不同的词汇,要考察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定的联系。在《辽与“大食”》一文的末尾,我写道:“对于单一概念的研究是人们探寻历史演变真相的方法之一。现在我们发现‘大食’与‘回回’这两个单一的概念汇合在一个点上,而且它确实含有历史活动及其意识表现的某种内容。对此,我们真感欣然不已。”

学人们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解决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难题,使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确切和充实,也使历史研究本身更加深入和开阔。在《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的末尾我是这样写的:“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特殊语词的研究有时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今天我们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各种语言中的特殊语词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许多具体面貌,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还可以这样说:一个注意到语言学比较研究方法的学人自会独具慧眼,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更多的问题,更有可能品尝“预流”之果,

登入学术的堂奥。

三

下面我再结合本文集的若干文章谈谈学术视野的问题。

一般说来,人们都主张学术视野要开阔,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很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博与专的老问题。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壮美境界的时候举引的诗句之一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十分欣赏这两句诗,几乎是我的座右铭。一种描写美境的文字怎么会成为座右铭呢?原来这十个字竟也与治学有相通之处。壮美,这就是博。“大漠”是壮美,“长河”和“落日”都是壮美,但“孤烟”不是壮美,“孤烟”与“大漠”在一起才构成了壮美,两句诗联在一起更重笔描写了壮美。那末,在学术上,我们在观看“大漠”时是否也见到“孤烟”了呢?我们是不是善于将“孤烟”置于“大漠”之中甚至再与“长河”、“落日”联在一起而进行学术思考呢?

我对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兴趣比较浓厚,我希望文集中有关烧酒与茶的文章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大漠”中的“孤烟”。我长期以来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研究十分关注,但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已经做得既广又深,自己只是就学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在有所积累的基础上,提出些一得之见。针对迄今仍有人在讨论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时以“漏写问题”作为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的“论据”,我们在具体讨论马可波罗为何未记茶和长城的时候反复申述了如下论点:“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古代旅行家留下的游记,宜从总体上探讨它的真实性,特别需注意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是否正面提供了可以

印证的新资料。以这样的标尺来衡量,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可波罗研究已经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描述从总体上看是真实的。反之,如果只要指出某部游记没有记载某些内容,就否定它的真实性,那就几乎可以否定全部游记,但这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苛求,缺乏逻辑的说服力。”而《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一文则拟在一个开阔的历史背景下来回答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有记载长城的问题。就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来说,也许它呈现了“大漠孤烟直”的图景?

读书要博,研究要专。但是,时间是个常数,博与专一直要两面顾及,很是为难。而且,专者钻也,钻了进去,再钻出来,也不容易。尤其是专有所成,或许就会以当专家为满足。年岁渐增,精力渐衰,又易懈怠。行与思,实际上不断会产生影响既博又专这个治学的基本要求的做法和想法,我要不断地加以克服。学无止境。我喜好学习,尤其始终愿意学习新的东西,从事新的探索,这样地在学海漫游,并愈来愈享有意想不到的乐趣和欣喜。

1993年秋天,我在美国马塞诸塞州剑桥一带游学。有一天,我第一次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阅览室,经管理人员同意,被允许进入书库。我对中国古籍比较熟悉,还事先带了想特别寻找的书目。但我不查目录,直接逐架逐格进行“扫描”,间或抽阅一下个别函册。这也是我素常享用的一种乐趣。蓦抬头,我看到了一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我隐约记起,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刊的最早的中文期刊,而且国内极少收藏。我取下翻阅,发现竟有39册之多。后来在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对它的整理,并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其实,我研究中西关系史有年,过去所做的题目基本上没有进入十九世纪的;但是平时买书读书和从事教学,还是注意到新教传教士所办的文化事业中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种刊物。我想